

黃伍和 副技師

民國一〇三年五月六日黃
伍和於本處受訪



網球場上人影四處竄動，網拍揮球的「啾啾」聲不絕於耳，早起運動的民眾讓球場應接不暇。打完一輪球，汗流浹背的黃伍和正和朋友聊天，享受運動後的整體舒暢感覺，即使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但進行網球這種激烈的運動，黃伍和卻有不輸年輕人的體力，他認為，這一切都要拜在森林保育處四十多年工作的磨練。不管是棲蘭山、立霧溪工作區、和平地區等山林，他幾乎都已走遍，見證了森保處這些年來的森林開發、造林、育林，並做出了一己的貢獻，而幾十年來的山林走透透，也為他的身體健康儲存了堅實的本錢。

黃伍和出生於民國二十九年，是宜蘭本地人，當年還是日據時代，一般家庭經濟狀況普遍不佳；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隨後播遷來臺，此時臺灣也仍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七日東西橫貫公路破土動工，為長

久處於落後地區東臺灣帶來成長的生機。黃伍和於此時考進宜蘭農校（宜蘭農工前身）森林科就讀，他單純的認為，從事森林開發相關行業，待遇應該不錯，對於改善家計定有直接幫助。「四十八年農校畢業時，森林開發處也於當年成立，我的人生第一志願就是要到開發處來，否則，當年也考上宜蘭高中，但沒有去讀，我就是想從事森林工作。」

森林開發處成立時，需要廣徵人才，黃伍和便在此契機下，於四十九年底應徵進入開發處，當時是前往棲蘭山區擔任檢尺工，這一待就是七年，期間除了五十一年至

五十三年間，在關渡師服兵役外，他在棲蘭山區整整工作五年。「那時上下山都是搭運材卡車，通常半個月左右才能下山一趟，不過，自己只有二十出頭，吃點苦也算不了什麼。」



民國五十年代人工伐木作業

在山上伐木檢尺的第一現場，大家都是住在設備極為簡陋的工寮中，那時的生活真是大不易，黃伍和對於山上的冬天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冷嘛！冬天經

常下雪，雪若太大，有時就無法上工，大家只有在工寮內圍著火爐烤烤火、聊聊天，否則就是打打麻將，以消遣孤寂。」那個年代也沒有發電機，夜間都只能靠電石燈、煤油燈或蠟燭照明，長夜漫漫，一燈如豆，沒有在現場待過，確實很難以體會老前輩們在開發山林時的艱辛與寂寞。



民國五十年代貯木池的貯材檢尺作業，中著西裝者為林茂雄。

不過，山上工作雖辛苦，在酬勞方面還是有所補償。「四十九年時，我們的薪水比公務人員還要好，我一個月大約可拿到一千元，公務人員中，只有銀行界比我們高，老師的薪資也不如我們。」黃伍和記得，當時有好幾位檢尺工，是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但卻仍願意來開發處，因為那時公務人員薪水也只有七、八百元。此外，伐木及監工人員的薪資則更高，因為

工作性質更為危險之故（有項數據可以更了解那時的薪資結構：當年軍職上士士官，月薪一百三十元，尉、校級軍官約為二、三百元；而按件計酬的森林開發處運材車司機，若能努力一些，月薪可達到三千元以上）。



民國六十六年立霧溪工作區索道第三起點

於五十六年離開棲蘭山工作區後，黃伍和被調到製材廠，擔任品管生產工作，到七十年重返棲蘭山，期間亦曾待過立霧溪工作區，七十六年開始辦理枯立倒木作業，一直到八十八年結束，再回處裏生產組，直到升任副技師退休。其中除了製材廠的十年，以及生產組的兩年之外，大概有二十五年的時間，他都在山上工作現場生活，對於山林間的一切，早已熟悉無比。

森林開發處於民國四十七年開始籌備期間，第一任處長、曾經擔任太平山林場場長的沈家銘即擔任籌備處主任，黃伍和記得，當時沈家銘接任處長後，從林務局太平山林場帶了許多監工、伐木、集材架線的專業師傅過來；許多

臺大森林系一、二期畢業的高材生，以及像他這樣由宜蘭農校畢業的前後期學長學弟，也有大批人員進入開發處，因此，當時的人員素質水準是相當高的。而當年這些林務局的師傅們教導開發處的同仁及榮民各項技術，到了今天，林務局反過來要向森保處學習架線集材的技術了。

另一件讓黃伍和記憶深刻的是，早期林務單位以林木種子直播或裸根苗方式育苗造林，但成效較差，森保處研發以塑膠袋育苗造林後，終能克服氣候環境的限制，提高造林成效。第二任處長彭令豐還代表中華民國，出席第六屆世界林學會議，並發表相關專題報告，研究成果獲得與會專家學者的肯定與重視。除塑膠袋育苗外，水平帶狀橫坡造林，也是由森保處最先開始實施，這項方法也充分修正順坡造林不易水土保持的缺點。



民國五十年代大甲溪林區草地順坡造林



民國八十年代枯立倒木整理木材檢尺作業—簡勝男技術士

黃伍和舉臺灣柳杉造林政策為例指出，一九〇九年，日人引進吉野柳杉試種於溪頭，由於溪頭屬山谷地形，濕度高，氣候與原產地接近，十年後研究發現，該批柳杉樹

高及直徑，均較日本原產地高出二倍以上，這也成為臺灣陸續種植柳杉之濫觴。而經過日本殖民時期，即使臺灣重新回歸祖國，但農委會及林務局許多老前輩，仍然延續此政策，持續引進日本柳杉在臺種植。由於森林保育處的許多經費來自於農委會及林務局，因此，造林樹種的抉擇，也非森保處說了算。

曾到日本研習的黃伍和說，在日本觀摩時，發現柳杉的種類有幾百種，當年剛開始種植時，種子也許是好的，但後來沒有實施選種，因為臺灣本地的地理環境與氣候和日本當然有差異，許多柳杉引進後，在中南部長得都還好，但在宜蘭這種潮濕多雨的地區，很容易就會成為材積黑心，經濟價值較低的林木。早年也許還可以將柳杉運用製作木質電線桿，但在現階段，這樣的樹材只能說是「利不及費」，根本沒有開發採伐的價值。

為彌補這些森林政策的缺憾，森林保育處採取了柳杉行列疏伐計畫，也就是配合林地地形，砍三行留六行，所謂的「砍三留六」，疏伐帶的三行，種植紅檜、臺灣扁柏、巒大杉、肖楠及牛樟等原生樹種，如此做不僅可以改善林相結構，同時對於自然景觀維護、野生動物繁衍、減少病蟲害及森林火災，均可產生很大效益，而這項政策也是由黃伍和來執行辦理。

對於森保處廣為人知的經濟作物猴頭菇，黃伍和說，早年的經濟作物，其實不止猴頭菇，處裏還曾試驗栽種過日本松茸以及愛玉子，因為松茸屬於高級食材，一斤可能高達上萬元，但後來因為沒有成功，故已被人遺忘；愛玉

子雖然栽植成功，但其經濟效益不顯，故也放棄。現今的猴頭菇，仍然受到氣候及溫濕度影響，因此無法穩定量產，但對森保處來說，這項產物也有正面宣傳的功效。

回想自己在森林保育處這四十二年的時光，黃伍和非常珍惜，早年山上生活非常刻苦，許多年輕人不願上山，但他們堅持在山上奉獻，除了薪資較高外，其實他們對於山林的熱愛，才是在面對困苦生活時，能夠甘之如飴的真正關鍵。當年在山上開路或伐木時因公殉職的許多同仁，在紀念碑揭幕時，也算向世人表彰了他們為國奉獻犧牲的英勇事蹟，黃伍和總結說，往者已矣，希望未來國人能夠對臺灣的山林更多些關注，才能使後世子孫可以永遠與青山綠水和平共處。



民國一〇三年鄭仰生處長率張明洵總技師（右三）、于幼新組長（左二）及陳駿銘主任（右二）等人至司馬庫斯古道勘查。

朱保華

副技師

民國一〇三年十月二日朱保華於宜蘭受訪



輔導會森林保育處五十五週年處慶的會場上，洋溢著濃郁又溫馨的氛圍，已退休的老員工們回到老家來，招呼聲此起彼落，許多人三三兩兩圍成一圈，彼此互訴離情，以及暢談當年勇；現任員工與老前輩們也聊起當年共事的情景，大家臉上的表情或驚訝、或歡笑，心中則是滿滿的喜悅與感恩。朱保華和老朋友們聊起木工廠的往事時，也是止不住的笑與淚，那畢竟是他奉獻出人生中最寶貴光陰的地方；在宜蘭居住時間已超過一甲子的他，雖然祖籍在大陸，但早已把森保處和宜蘭當做是自己的老家與故鄉。

出生於抗戰勝利後一個月的朱保華，是湖南長沙人，身為軍人的父親，擔任的是管理糧餉、後勤補給配備的兵站分監，官拜少將，抗戰勝利後，工作及任務益形繁重，因為當時國共內戰烽火已起，在朱保華的記憶裏，幼年時

就是隨著父親單位的調動，四處為家。當時父親先是擔任廣西省供應局局長，後期則接掌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車管處處長，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情勢危急時，父親才帶著母親及剛滿四歲的他，輾轉經由香港來到臺灣。

由於他父親原本所屬的單位在撤退來臺時已經被打散或併編，單位內的成員即變成無職軍官，雖然當時還沒退伍，但已被視為榮民。他們一家人在臺北待了半年之後，被輔導會安置到宜蘭的三星農場，父親則是在民國四十六年，他國小畢業時正式退休。在朱保華的童年回憶裏，全部充斥著宜蘭當地的畫面，他在這裏成長、讀書，一直到民國五十八年大學畢業，適逢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前一年開辦，師資很缺，他一畢業便回到宜蘭三星初中擔任教職。

朱保華的老師工作只維持了七個月，因為父親年歲已高，他很想協助母親就近照顧父親。正巧當時的輔導會主委趙聚鈺來到宜蘭視察，同時會見宜蘭當地的榮民，探詢大家的需要，並解決問題。朱保華的父親便與趙聚鈺主委談到自己家庭的狀況，由於趙聚鈺也是湖南人，與朱保華父親是同鄉，便積極幫忙；因為森林開發處在宜蘭當地是大單位，營運狀況也不錯，在趙主委的協助下，朱保華便在民國六十年，先到專做木器的桃園工廠，因為他在大學時主修企管，便擔任負責生產管理及品管的技術員。

在桃園工廠待了四年後，因父親又罹患了巴金森氏症，他在桃園實在不易照料父親的病情，於是他便向當時也兼任桃園工廠廠長的彭令豐處長報告，希望能夠調回宜蘭地區，經彭處長同意後，他於民國六十四年調回木材加

工廠，擔任生產品管的技術員。「那是木材加工廠的黃金時期，業務量大到幾乎天天晚上都得加班」，朱保華記得很清楚，當時最熱門的產品，就是學生課桌椅。



民國六十四年木工廠職員合影，前排右起林靜山、陳義登、朱保華、農錫湖；後排右起曹九孝、李俊、李明遠、廠長劉周、黃進和、譚金漢、袁廉泰。



桃園工廠生產課桌椅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民國五十七年實施後，軟硬體的需求量都大增，學生上課的課桌椅便成為森林開發處木材加工廠的重要產品，調到木材廠的朱保華是負責產品的品管，對於當年工廠的盛況記憶猶新，那



桃園工廠製作的高級木製家具



民國六十年木材加工廠課桌椅組裝作業情形。由於九年義務役教育政策的推動，學校課桌椅的需求極大，當時可算是木工廠產值相當輝煌的年代。

時雖然天天要加班，但員工們的士氣都極高，希望能做出品質第一的課桌椅，他在品管時也不敢稍有鬆懈，記得當

時課桌椅一年的產量高達二十萬套，確實是木工廠最輝煌的時光。

朱保華之前在木材加工廠工作時，擔任廠裏生產組組長的鄒茂雄（後升任至總技師）對他相當賞識，當他調回處本部接任企劃組組長時，便將朱保華也調回處本部，協助他管理專案及木材加工的經營企劃，當時是民國七十年。對於鄒茂雄這位長官，朱保華心存感激，因為組長不僅愛讀書，也身教重於言教的鼓勵同仁們進修充實自我；而朱保華的姻緣，更是鄒茂雄一手促成；他憶及當年在桃園工廠生產組，太太服務於會計室，兩人的辦公室門對門，由於男未婚、女未嫁，身為頂頭上司的鄒茂雄便鼓勵朱保華



民國六十年代木工廠組合包裝作業

努力追求，同時在一旁大力撮合，最終朱保華與太太在民國六十二年結婚，美滿婚姻延續至今已四十一年。

在處本部服務四年後，朱保華先後在機料組及人事室分別工作一陣子，於民國七十六年再度回到木材加工廠，因為當時環保意識已逐漸抬頭，而政府於民國七十八年也明令禁止伐採針一級木天然林，使得木材加工廠的營運大受影響，再加上當時經濟起飛，臺幣逐年升值，原物料及人事成本均大幅成長，廠裏許多外銷產品，已無法與本國及國外的大廠競爭，負責生產管理及經營企劃的朱保華對於局勢及遠景看得很清楚，但整個大環境如此，根本無力回天。

後來在民國八十三年，政府修正輔導條例，取消榮民事業的優先議價權，這也使得榮民事業的競爭受到巨大衝擊，木材加工廠的運作猶如雪上加霜，業務量不斷萎縮，「在我回鍋木材加工廠時，課桌椅的生產數量由當年的二十萬套，已經掉到一年只剩二、三萬套。」當國內天然林無法再砍伐時，木材加工廠後期的成品原料，幾乎都是由美加進口的鐵杉，再加上許多如塑膠、鋼鐵成品及壓克力等木材的替代品出現，終使木材加工廠一蹶不振。

那段時期裏，森保處的業務量緊縮，人事也跟著縮減，隨著人員精簡與人事凍結，留下來的人員所須負擔的工作量反而增加，朱保華記得自己當時便是管理總務兼人事以及勞工安全。當然，由於沒有安全感所造成的人心惶惶，自然也衝擊到工作士氣。為了解決這個困境，朱保華在內的各級幹部，在當時李惠鈞處長的指導之下，希望能夠藉

由行銷通路，來開創一線生機，於是，臺灣檜木藝品展示場（奇木館）便應運而生。

朱保華說，民國八十八年在現在劃給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的這九公頃土地上，他們規劃成立了奇木加工品及木器藝品的大賣場，展場至少三、四百坪，這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的大事。初期生意相當不錯，但時間一久，他們當初規劃的盲點及死角也就顯露出來。因為奇木藝品通常價值較高，客源層也較稀少，難以吸引普羅大眾的購買慾，好景不常，民國九十五年，奇木館便結束營運，當時朱保華也已退休。但他認為，森保處的同仁們至少有努力過，也做了各方面起死回生的嚐試，所以，他並不後悔。

朱保華負責的工作是生產管理及經營企劃，當時由於環保意識抬頭，及木材加工因禁伐而業務緊縮後，許多閒置的機具無法充分運用，他一直感到非常可惜，但因為屬於公務單位，能夠運用的彈性自然也受到限制，對於無力為森保處多設想一些改善營運發展的作法，是他深深感到內疚之處。

至於各界眾說紛紜的林區經營之道，部分學者及環保團體認為，森林不應砍伐或整理，就放任其自行生長茁壯；但更多的學者專家認為，枯立倒木不整理，容易引發森林火災，颱風或土石流可能將枯木沖下山，造成水庫淤塞壽命降低，或引發更嚴重的即時災害。各家的說法他沒有意見，但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無論如何都應尊重專業，但國內許多事情往往民粹凌駕於專業之上，即使你有理也說不清，這是最令人感到心痛之處。」

森林保育處成立已滿五十五週年，在慶祝會場的熱烈氣氛中，朱保華認為，「先不論森保處的功過，至少其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當年為安置開闢中部橫貫公路的榮民而成立森開處，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於這一大片山林的開發整理，森保處及榮民們無疑是費盡心血，也交出了亮麗成績單，同時對於宜蘭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地方繁榮更做出最實質與直接的貢獻，可說是了無遺憾。他期許森保處及現職同仁們，能夠如同舞臺上的標語，「榮啟山林，締造佳績，世代流傳，生生不息。」使森林保育處這些年來的努力與付出，能夠長遠的發揮影響力，這也就不辜負了榮民前輩們這麼多年來，為這片山林所做出的犧牲與奉獻。



外銷家具組

帥英才 技術士

民國一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帥英才於本處受訪

天還沒亮，摸索著下了床的帥英才，已經開始多年來在住家附近例行的晨間散步活動，抬頭看看西邊由北往南走、環繞著宜蘭的群山，他邊吐納呼吸，邊在心中吟詠著自己最常掛在口邊、宋朝詞人辛棄疾「賀新郎」中的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多年來在山中行走，與山林共同生活的帥英才，十分感佩熱愛大自然與青山綠水的辛棄疾，藉著筆鋒，輕易便點出了縱情悠游於山林原野人們心中的脫俗清閒心情，在森林保育處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讓帥英才不僅成為樂山的仁者，他更愛山、戀山，毫不保留的將自己融入於這片青山綠水之中。

操著一口濃濃山東腔調的帥英才，家鄉在山東安邱，出生於北伐完成、日本侵略野心已經逐漸展露的民國十八



年三月，時代雖然動盪，但因為家中還算小康，帥英才七歲進入私塾啟蒙，對日抗戰期間，就讀師範學院，日本投降後他也從學校畢業，成為那個年代極為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後因國共內戰，他從軍後一路隨著部隊輾轉經由舟山、登步島到臺灣。

初抵臺灣，部隊駐紮在彰化，但因兵源不足，卻需日夜構工，由於工作繁重、壓力過大，導致眼睛視力受損，一直到今天都深受其害。民國四十五年退伍後，帥英才在臺北山林管理所礁溪分所找到一份工作，是在林業隊砍草種樹。四十六年六月，當時擔任輔導會主任委員的經國先生因公來宜蘭，途經礁溪山上時，遇見帥英才。

當時的情形帥英才記得很清楚，「經國先生知道我是師範畢業生後，便問我為何年紀輕輕（二十七歲）便退伍。可以去當教員，好好發揮所長，教育下一代。」帥英才便向經國先生報告，



蔣經國對榮民相當照顧，帥英才感受尤其深刻。圖為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七日行政院長蔣經國（中著夾克者）巡視明池苗圃。

自己的眼睛不好，「當教員怕誤人子弟，有愧良心」，經國先生還勸他放寬心，好好工作。之後輔導會還曾派人邀請帥英才到宜蘭縣府工作，帥英才則仍以「自食其力」為由婉拒。



民國五十年代本處所設立的林區造林保林宣導牌

後來林務局舉辦退伍軍人講習，帥英才在講習完畢的考試拿到第一名，於是他進入林務局擔任林政工，他心中的想法是，做這項工作至少自食其力，不會拖累到其他人。不過，林政工的首要工作必需巡山，防止盜採盜伐，有一次他在巡山時，看見三個上山砍柴的女孩子，個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每個人都背著一大捆剛砍下來的木材，看見他要取締她們，三個

女孩忍不住都哭了出來。「在自己的工作責任上，我必須取締她們的盜伐行為，但在情理上，我也知道她們是為了生活，才會如此做，心中天人交戰哪！」帥英才最終將三人放行，但他也因此辭去這份工作。

由於愛上與山林為伍的生活，帥英才在民國四十九年

寫信給經國先生，希望能夠去輔導會森林開發處（當年名稱，現為森林保育處），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他印象非常深刻，在以主任秘書趙聚鈺署名調他去森林開發處的公文上清楚寫著，「順其自願，不得勉強，妥善安置」等內容，於是他於五十年二月來森林開發處報到。對於經國先生熱心關懷榮民，不遺餘力妥善照顧安置的溫情，讓他永遠難忘，他認為，這也是所有榮民袍澤視經國先生為大家長的真正原因。

到森林開發處報到後，帥英才的工作，仍然是擔任林政工，巡山成為他的家常便飯，且由於具備師範學歷，他也成為整理公文檔案的箇中好手。受訪當下，帥英才翻開由森林保育處編纂的「霧林一百」棲蘭山環境教育解說手冊，其中第二十四頁為「棲蘭山林區示意圖」，在那約為三十萬分之一比例尺的圖上，帥英才伸出手指滑過圖上每個地名，他說，整個棲蘭山林區分為烏來、宜蘭、太平山以及大溪四個事業區，範圍含括新北市、宜蘭、花蓮、桃園、新竹、南投等縣市，八萬七千多公頃的山林面積，「我幾乎都走遍了！」帥英才的語調平緩，但那股對於山林的執著熱情，卻深深震撼人心。

談起自己的巡山經歷，帥英才也不免顯現幾分自得，由於人力因素所限，他常常一個人單槍匹馬出發，在各個林線之間穿梭，如入無人之境，山上四季的景象分明，總能給登山者帶來無限的驚喜。「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到司馬庫斯這一線，真的是崎嶇難行，但那壯闊瑰麗景色，卻讓看過的人永遠難忘。」帥英才的話令人一驚，即使在今天，